

■90岁的摄影大师记忆中那些声名赫赫的朋友
■本刊记者伴随法国摄影大师的皖南之行
■约翰·斯图亚特与南京的一个约定

11月17日的南京,温度降到了零下,地面上还留着厚厚的雪。一个叫约翰·斯图亚特的法国摄影师如期而至。火车到站后,他从容地打开行李箱的拉杆,跟着人潮一起向出口走去。没有鲜花、没有闪光灯,90岁的他,早已经习惯了这一切。“你知道布列松吗?”如果别人想和他讨论摄影,这是他经常要问的问题。他相信,如果你不知道布列松,你就没有资格谈论摄影。同样,他也相信,如果你不懂安迪·沃霍尔,你就不能理解什么叫做现代社会。而这两位艺术世界里的大师级人物,其生前,都是约翰·斯图亚特最要好的朋友。

他曾挨过拳王阿里一拳

“你可以说我是布列松的朋友”

虽然提前一天,就得知约翰·斯图亚特会来南京,但是在南京站与这位老人面对面的时候,记者还是吃了一惊。此次来南京,他真正的目的是要去皖南拍照片,山高路远坡滑,一个90岁的老人如何吃得消?另一个原因,约翰此行只带了一个30出头的法国老乡。小伙子名叫马久·吕那,说一口颠三倒四的汉语,一周前,身在上海的他与刚从法国独自来沪的约翰相遇,一番长谈后,同样身为摄影师的马久自告奋勇为约翰当翻译。

值得马久这样付出的约翰到底是什么人呢?带着这样的疑问,记者和两位法国摄影师一起踏上了皖南之行。征得约翰同意后,记者开始了例行公事的采访。

“您多大年纪了?”开场白是这样的。

“我太老了,所以忘记自己的年龄了。”约翰耸耸肩膀,然后眨眨眼睛,压低声音俏皮地说,“我是1919年出生的。”

“我该怎样向您介绍您?”

约翰点了一下头,很认真地说:“你可以说,我是布列松的朋友。”

布列松是世界著名的人文摄影家,被誉为“现代新闻摄影之父”。这位开创了现代新闻摄影的大师,和中国的渊源颇为深厚,他不仅用镜头记录了民国末期的上海和北京,而且还在文革期间来到中国,拍下了大量的照片。

上世纪中期,约翰在巴黎认识了布列松。刚刚从法国军队退役的布列松,和曾在英国军队服役过6年的约翰,有许多共同语言。他们都曾经随盟军到过亚洲,都喜欢绘画,而且,在二战结束之后,他们都全面转向摄影。

“毕加索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”

上世纪中期的法国,艺术大师云集,这给了约翰许多的机会。他为毕加索、马蒂斯、布拉克等大师拍过照片。其中,和毕加索的交往,一直让约翰津津乐道。

“大概是上世纪40年代末,我为毕加索拍照。一次,一个美国收藏家来找毕加索,我们三个一起去当地的一家咖啡馆聊天。”

“咖啡馆的桌子上,铺的不是桌布,而是一张纸。毕加索一边和我们聊天,一边信手在纸上画画。很快,一幅画就出来了。美国收藏家惊叹不已,连连称赞。毕加索说,那么,这幅画就归你了。收藏家捧着画,欣赏了半天,然后说,请您给我签个名吧。毕加索拿过画,就在上面签下了

自己的名字。收藏家乐坏了,迫不及待地要把画收起来。谁知毕加索盯着签名看了一会儿,说:“哦,不该签在这里。”他一下撕掉签名,然后在画的上面重新签了一个。签完以后,他又不满意,又撕掉重来。”约翰伸出拇指和食指,比划出一个小框,说:“最后,画变得只有这么大了。”

说到这里,约翰忍不住哈哈大笑,“毕加索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了。”

1951年,带着给大师们拍的照片,约翰去了纽约,成功敲开了纽约时尚界的大门。他为卡地亚、科蒂等大品牌拍过照片,也拍过很多漂亮的模特。曾经有一度,他专门为被称为“时尚圣经”的《Vogue》杂志拍照。

上世纪70年代末期,约翰下定决心告别时尚界,开始一心一意拍摄静物。“我喜欢意大利画家莫兰迪的作品,宁静的枯萎,那种境界很美。”

“二战期间,我被日本人关了三年半”

在愉快的谈话气氛里,车子开进了一个叫查济的村子。这个村子,因为蜷居深山,许多明代的老房子和旧式生活方式得以完整保留,因此被约翰相中作为拍摄对象。下了车,就是青石板铺成的乡间小道,路宽只容一个人通过,一边是住家,另一边是条潺潺的小溪。我们卸下行李,走向借宿的人家,这户人家的主人,是南京的一位画家。

入夜,主人烧起了壁炉。在热乎乎的空气里,约翰情绪大好,开始讲述年轻时的事。

“我出生在伦敦,在法国接受了教育。二战时,我在英国军队服役。后来,部队开到了新加坡。不幸的是,我被日本人抓到,关进了监狱。日本人把我们押到泰国的桂河河畔,在那里修公路。”

从1942年初到二战结束,约翰在日本人的集中营里整整住了三年半,“很多同伴都死了,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能活着出来。日本军队非常残暴,他们屠杀当地居民,特别是对华人,更加不留情。我曾经亲眼看到,日本人把中国婴儿挑在刀尖上。”

幸运的是,二战结束了,约翰离开了战俘集中营,“虽然坐了三年多监狱,但是我真的爱上了亚洲。从事摄影以后,我多次到亚洲拍照。泰国、斯里兰卡、印度,我都去过。我还到了日本,日本不错,日本人也不错。战争是坏的,它扭曲了人性。”

1988年,约翰第一次到中国旅行,他到了甘肃、西藏、四川,美丽的景色让他惊叹不已。那一年,他69岁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对生活有了新的理解。一切都重新开始。”

他和一条扫把较上了劲

第二天一大早,约翰就准备去拍照了。他带了两部相机,一部是数码相机,另一部是用胶卷的120相机。约翰告诉记者,一旦确定了拍摄对象,他都会使用120相机,“如果不能确定,我就先用数码相机拍,看效果怎么样。然后再决定是否用胶卷拍。”

什么样的拍摄对象才合约翰的法眼呢?带着这样的好奇,记者跟着约翰出发了。结果,还没出大门,约翰就捕捉到了对象。约翰看中的,是一把光秃秃的扫把,正孤零零地靠在院子中间的一块大石头上。靠近拍、离远拍、站着拍、弯着腰拍,约翰很是忙乎了一阵,然后才笑咪咪地走入。

大门还没出,约翰又看上了堆在院子角落里的几个南瓜。

大概是对拍摄的角度不满意,约翰找来一把竹椅子,让马久扶着,自己站上去拍。胖乎乎的他,站在摇摇欲坠的小竹椅子上,让人看得胆战心惊。

在路上,我们遇到了几个当地人,他们拎的竹手炉引起了约翰的注意。竹手炉是当地冬季常见的一种取暖设备,外表就像是一个小竹篮,精致小巧,拎在手里很方便。竹篮里面有个小铁筒,铁筒里面装着燃烧过的煤灰,用一块布盖起来。约翰对徽州人的这个发明惊叹不已,连着拍了好几个人。

在当地人的带领下,我们又去了附近的一个村子。墙头的小草、上翘的屋檐、老旧的大门、门

上的春联、铁质的门闩、祠堂里的石柱础,这些都被约翰一一纳入镜头。

一天很快就过去了,除了一顿午饭,约翰几乎都是在走路和拍摄,而且断然拒绝别人的搀扶。显然,他对一天的工作非常满意,晚饭后,坐在壁炉旁,话匣子又打开了。让我们想不到的是,他和波普艺术的鼻祖安迪·沃霍尔竟然也是好友。

“让我们谈谈给毛泽东画过像的人”

约翰把安迪·沃霍尔称为“那个为毛泽东画过像的人”。

作为20世纪波普艺术的最著名代表人物,安迪·沃霍尔以毛泽东、玛丽莲·梦露、the Velvet Underground乐队、可口可乐等为对象,进行过一系列创作。

安迪·沃霍尔创作的毛泽东头像,是把毛泽东的照片反复复制,然后在面部、衣服和背景之间变换不同的颜色。分别有红色、绿色、蓝色、白色、黄色、青色等等,出现多种可能的艺术效果。前几年,毛泽东系列中的一张,被一位香港商人以1700多万美元的天价买下。

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,游走于美国时尚界和艺术界的约翰,不仅认识了安迪·沃霍尔,还和抽象派画家杰克逊·波洛克成为朋友。年仅44岁就殒命于车祸的杰克逊·波洛克,其作品在2006年更是卖出了1.4亿美元的天价。就是这位创作了奇迹的画家,当年曾要求朋友约翰买他的作品。

“他对我说,嗨,伙计,买我的画吧。我问他要多少钱,他说50美元。我说,我得工作一个星期才能挣这么多钱,才不要买你的画呢,不值得。”

意外摔倒,鼻子缝了五针

到了皖南的第三天,约翰又拍下了很多细节。当地人做毛笔、做宣纸、做豆腐,这一切都让约翰着迷。作为一个90岁的老人家说,他的精力让人瞠目结舌。然而,就在结束一天的工作,即将回到借宿地的时候,意外出现了。

在走过一座小桥后,约翰突然摔倒了。灰色的灯芯绒裤子,军绿色的外套,庞大的躯体,90岁的约翰·斯图亚特趴在青石板桥上。就在大家还没反应过来时,他周围已经是一片殷红。

约翰的鼻子摔伤了,一直流血不止。一番简单的治疗后,约翰被送进了县医院。一路上,同车的人心情都很沉重。唯独约翰,捧着流血的鼻子却神色自若。到了县医院,医生给约翰的鼻子缝了五针,又拍了片子,结论是鼻梁骨折了。

从医院回来,已近9点了。吃过晚饭后,约翰就要求主人给他一瓶威士忌。大半瓶威士忌下肚后,约翰的情绪又好了起来。他侃侃而谈当年为拳王阿里拍照的经过。

“那是1977年,我为他拍了几张他很满意的照片。拍完后,我开玩笑说:‘你应该请我吃饭。’他说:‘那可不行,我讨厌你们白人。’我说:‘这并不是我的错,而是你的错。’听了我的话,阿里用他的拳头捅我的肩膀。”约翰摸了摸自己的左肩,仿佛那一拳仍旧让他隐隐作痛,然后,他换了笑咪咪的表情说:“你猜怎么着?后来,他不仅请我吃饭,而且请我去了他家。”

这晚的谈话结束后,约翰决定,第二天就借道南京,返回上海,因为县医院的医生说,他的鼻子需要在上海进行治疗。

明年春天来参观江东门纪念馆

等火车的空隙,记者开玩笑地问约翰,“你曾经和安迪·沃霍尔、杰克逊·波洛克这样的人是朋友,如果当初收藏了他们的作品,现在可就是大富翁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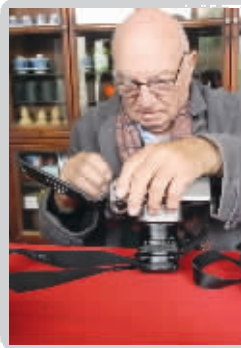
约翰说:“坦率地说,那不是我喜欢的风格。我现在过得比上不足,比下有余。最重要的是,这一生我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我是个自由职业者,年轻时,如果作品卖得好,日子就很风光,作品卖得不好,日子就潦倒。现在,在巴黎的画廊和博物馆里,都有我的作品,我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。”

记者又问:“我可以称您为大师吗?”

约翰大笑:“当然可以。”然后,他问身旁的马久,“大师的箱子呢。”

检票的时间到了,和来时一样,约翰打开行李箱的拉杆,跟着人潮向入口走去。在上海,11月26日,鼻梁上包着纱布的他,还需要出席自己的个人摄影作品展。这是他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次作品展,而此次皖南之行的作品,他将在巴黎展出。

“我还会来的。明年春天,我想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。”这是约翰·斯图亚特和南京的约定。本版主笔 快报记者 白雁 感谢汤国生对本文的支持



大师的镜头和镜头里的大师